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3.007

# 凝聚性结构、德育功能与共同体关联

## ——文化记忆视域下彝族文学的人类学阐释

李宁阳, 梅 军

**摘要:** 彝族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志属性、道德教育功能与共同体特性。第一,它是构建文化记忆基础的凝聚性结构,作为彝族历史记忆和知识图谱的载体和表征;第二,它是彝族文化主体传承和传播其道德精神的特殊文本,发挥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的重要德育功能;第三,它是共同体关联的交融记忆场,由内而外、从抽象到具体,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彝族主动而深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关注这类民族文学中的主位认知与自觉表达,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它们的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支撑和更强大的文化支柱。

**关键词:** 民族文学;凝聚性结构;民族志功能;德育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3-0056-10

收稿日期: 2023-12-21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博士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 CX2021BS09);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山地传统农耕文化遗产与新型农业形态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1GZZD25)。

**作者简介:** 李宁阳(1994—),男,贵州威宁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E-mail: 1757915168@qq.com;梅军(1975—),男(苗族),湖北来凤人,贵州民族大学东盟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民族学、文化遗产研究。

我国各民族或通过口述,或利用文字,创造了史诗、神话及经典等“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反映民族生活,并以民族语言表达”<sup>[1]</sup>的民族文学<sup>①</sup>,它们是超越了交流记忆的集体性、公共性、组织性的文化记忆<sup>[2]38</sup>,乃历史记忆与社会情景的双重影子<sup>[3]</sup>,包含着历史事实和文化真实<sup>[4]102</sup>。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那里,它们具有“集空间、符号与表征于一体”<sup>[5]</sup>的“凝聚性结构”<sup>[2]6</sup>的基本属性,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联结着自我和他者,将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保存,构建既有文化真实与历史事实,也有象征符号与诗性逻辑的回忆空间。人们在其中将共享的象征符号、道德精神、公共记忆与历史经验进行整合、选择、重塑、存储和传递,构建传递价值、凝聚情感、关联认同的文化记忆。

##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的回顾

作为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和“记忆场”，民族文学的内涵和功能已在学界得到认可。首先，民族文学兼具文本和方法的民族志属性<sup>[6]</sup>，它从主位视角以诗性逻辑手法构筑“历史高楼”和构建“传统知识”，回忆人类童年与民族历史，描绘知识图谱与族群关系，传递道德训诫与生活经验，建构民族形象与族群身份，表达民族情怀与审美价值，是民族认同<sup>[7]</sup>与文化寻根<sup>[8]</sup>的历史根基记忆，为其文化书写主体之根基情感的稳定性、长久性和连续性提供记忆支撑和思想保障。其次，民族文学并非文化孤岛，而是族际互动的文化产物。在叙述的内容上，它通过抽象的诗性逻辑和具象的叙事逻辑表征和记忆着各民族的交往记忆和交融事实，自觉而主动地继承和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塑和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sup>[9]</sup>，揭示着我国各族共同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本相和文化事实。因此，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联支撑，在加强各民族的根本性情感联系<sup>[10]</sup>、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sup>[11]</sup>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12]</sup>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的诠释上，我国的多民族文学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述形式、共同构建着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格局<sup>[13]</sup>、共同诠释着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事实<sup>[14]</sup>，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家园，共同有力地驳斥了黑格尔关于“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sup>[15]</sup><sup>[170]</sup>的谬论。因此，民族文化在践行文化多元和谐理念<sup>[16]</sup>、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sup>[17]</sup>、丰富道德教育资源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等方面，理论价值极为突出。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他们通过口耳相传的口述形式与符号表征的文字书写两种文化记忆形式创造了类型丰富且卷帙浩繁的民族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就对彝族文学予以了较多关注和广泛研究。除了搜集整理相关口述类叙事文学并将其公开出版之外，主要通过四种学术脉络来对其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将彝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主要是基于记忆理论来分析彝族文学文本中的认同记忆，这类研究要么聚焦于某个单一的叙事文类，要么重视的是探究文本中表达的族内认同<sup>[18]</sup>，对于其中呈现的族际认同的关注不够，仅有李世武等少数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维度<sup>[19]</sup>，并讨论彝族文学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意义<sup>[20]</sup>。第二，从解释人类学的角度来诠释彝族文学中象征符号的意义与内涵。其一，阐释彝族文学文本中的民族英雄的文化形象<sup>[21]</sup>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sup>[22]</sup>。其二，提炼彝族文学文本中构建和传递的地方知识，解析其中承载和传达的信仰文化<sup>[23]</sup>、道德逻辑<sup>[24]</sup>、生态意识<sup>[25]</sup>、宇宙认知<sup>[26]</sup>、伦理精神<sup>[27]</sup>等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第三，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彝族文学自身的文化生态关系<sup>[28]</sup>以及彝族文学及其传承主体的生存发展和传承状态<sup>[29]</sup>等问题。第四，基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运用母题分析法和文本解构法来归纳彝族文学文本中的母题元素<sup>[30]</sup>，分析彝族文学的叙事逻辑<sup>[31]</sup>、诗学属性<sup>[32]</sup>及其文法结构<sup>[33]</sup>。综上，可以说人类学关于彝族文学的研究相对广泛和深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启示。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尚且存在可以继续深化和扩展的研究空间，如既有研究存在重民族个性的观察而轻族际共性的分析、重单一文本的解析而轻多类文本的比较等问题。本文在继承既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扩展关于彝族文学的观察范围，从更广泛的层面对多类彝族文学进行比较分析，为发掘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提炼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加文化养分和提供精神支撑。

## 二、作为凝聚性结构的彝族文学：追踪历史记忆与诠释社会文化

作为一种构建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彝族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志属性，它勾勒着其民族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来龙去脉，是其历史记忆的承载媒介和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是追溯民族历史、理解价值共识、形塑民族形象、强化族群认同的“原动力”。

### （一）历史记忆的承载媒介

历史记忆通常是对“从哪里来”“有何经历”“当下形成”等流变问题的追问，是民族起源的巩固式根基回忆<sup>[53]</sup>，承载着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性情感。历史记忆不仅内嵌于王朝实录、正统史书、典章会要、宗族谱牒、契约文书等典籍，展示于建筑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仪式性的身体实践，还以史诗、神话、传说等文学叙事为其媒介。《勒俄特依》《梅葛》《查姆》《阿黑西尼摩》《天地祖先歌》等史诗，开篇就回顾人类童年与民族历史，讲述祖先迁徙、社会演变和制度变迁。例如《勒俄特依》中“兹的住地”“合侯赛变”“古侯主系”“曲涅主系”等章节就是关于祖先分支迁徙、多民族杂居格局、彝族社会形态演变等的历史叙事<sup>[90-134]</sup>。又如《梅葛》中“婚事与恋歌”“丧葬”部分<sup>[162-292]</sup>以及《天地祖先歌》中“野人根源”“女权”“权利”“笃慕支系”“君制”“君臣分工”“结亲”“祭祀”“祭祀后”<sup>[36]</sup>，都是关于彝族社会制度礼俗的产生历史过程及其转型变迁的记忆表述，皆为彝族文学中承载的历史根基记忆，它们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作为其文化内部之族群认同的关键纽带和社会结构过程的推导依据。同时，还为民族历史书写提供了基础材料和佐证档案，是族内与族际、精英与大众等各类人群理解其历史本相和呈现其历史全貌的重要补充与有效旁证。

### （二）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

彝族文学不仅承载着追忆过去的历史记忆，还是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和传统知识的考古材料，构建着与其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疾病等相关的知识图谱，是其民族形象的形塑机制、社会面貌的展示空间和发展水平的记忆证明。例如《天地祖先歌》的“农耕”部分细致描述了彝族的传统农耕知识，“冶铁”“养蚕”则重点反映黔西北彝区的采矿、冶铁、养蚕及纺织等技术与技艺<sup>[6]</sup>。又如《梅葛》的“造物”<sup>[159-162]</sup>、《阿黑西尼摩》的“叭依定历法”<sup>[731-38]</sup>以及《查姆》的“书”<sup>[38135-14]</sup>等文本叙事都从不同程度阐述了彝族十月古历的创制由来、基本内容及与周期安排相适应的农事生产和其他社会节奏。再如《查姆》中的“纸和笔”<sup>[8125-134]</sup>部分详细地描述了彝族先祖关于造纸、造笔等书写工具的传统知识与技能，系统地呈现了当时彝族社会之书写技术水平的发展状态。还如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汇编了彝族毕摩《献药经》里丰富的传统医药知识，为彝族乃至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杰出贡献，当下市场热销的云南白药便是曲焕章根据滇南地区的彝族传统医药知识淬炼而成的<sup>[9]</sup>。不仅如此，在《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目录》中，收录的彝族医药古籍就多达200多种。综上所述，彝族文学中记录的知识图谱与追述的历史记忆一起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民族时空体系，它们通过纵向的历史脉络和横向的文化结构共同形塑了彝族的文化形象、社会结构、知识体系和整体记忆。

## 三、彝族文学的德育功能：传承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

彝族文学不仅是书写历史记忆与诠释社会文化的民族志，还发挥着传承传播道德精神和形塑伦理价

值的基本功能。它基于主位视角,或明训或暗喻,或反讽或正述,从个人品性、家族伦理、社会责任三个方面传递祖先训诫,提供道德价值,共同培育和传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文化。

### (一) 个人品性的塑造要求

首先,倡导正确的生活观与财富观,提倡勤俭节约、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态度。《梅葛》《查姆》以反例方式解释“独眼人-竖眼人-横眼人”更迭换代缘由之一是独眼人与竖眼人好吃懒做、不管田地、不耕庄稼、糟蹋粮食。如《梅葛》中竖眼人“不耕田不种地,不薅草不拔草……糟蹋五谷粮食”<sup>[35]27-28</sup>。又如《查姆》中独眼人“播种收割他不管,庄稼杂草遍地生”<sup>[38]26-27</sup>。再如《玛牧特依》叮嘱“贪财莫去偷……偷者最可耻”<sup>[40]42</sup>,认为“一人要富裕,手握长锄头,田间地头转”<sup>[40]61</sup>,传递不贪不义财而应勤劳致富的道理。创世神话中众神协力补天造地的情景也是其关于劳动创造生活、勤劳创造财富的价值认知。

其次,树立科学的知识观与诚信观,秉承求实好学、孜孜不倦、诚信为先的要求。如《玛牧特依》嘱咐处理问题时,要“求教老案例、老牧人和经典”<sup>[40]21</sup>,传承虚心好学的求知精神,并以“妇女撒谎遭议论,姑娘撒谎遭非命,小伙撒谎不体面”<sup>[40]43</sup>来警示对人、对事都要“守信用”<sup>[40]65</sup>。又如《阿黑西尼摩》指出竖眼人“大人欺小孩,小孩骗大人”<sup>[37]21</sup>而遭遇灭顶之灾,阐明诚信的重要性。再如《土鲁黎咪数》叮嘱要“学人家长处……从好上补充,从美中追求……令出一句话,九十马难追”<sup>[41]272-274</sup>,将勤奋好学和言而有信作为衡量个人品性的基本准则。

再次,秉承严格的孝道观与敬畏观,推崇孝亲敬长、长幼有序、敬天法祖的精神。如《阿黑西尼摩》中竖眼人“道理全不要,礼节都丢光”而“子种绝”<sup>[37]21-22</sup>。又如《查姆》中独眼人“不分男和女,不分长幼尊卑”<sup>[38]27-28</sup>而被洪水淹没。再如《玛牧特依》指出与长者同坐时,“长者坐上,幼者坐下”<sup>[40]245</sup>。还如《土鲁黎咪数》要求“孝敬父母者,脚迈出三步,敬爱语轻柔……承父志拓土,长母志守业……在神座周围,祭祀祖先”<sup>[41]263-268</sup>。诸如此类,皆为其重视孝悌伦理的具体表现。

最后,培育自觉的善恶观与交友观,树立善恶有别,惩恶扬善,扶贫济困的意识。如《梅葛》以天神寻找人种的叙事传达善恶观念,心恶的葫芦蜂被天神“鞭打、断腰及火烧”<sup>[35]40-41</sup>,心善的罗汉松、小蜜蜂、杨柳树则得到天神的奖励和封赠<sup>[35]42-46</sup>。又如《玛牧特依》中“能言善道者,己嘴是己友;拙言恶语者,己嘴成己敌”<sup>[40]31</sup>,以此教育个人在社交时应当养成谨言慎行的习惯。其中的“收养穷弱、孤傻家门、孤傻兄弟、姐妹、亲家”<sup>[40]169-171</sup>以及《土鲁黎咪数》中“把穷人接济,给寒者衣穿,给饿者饭食,给渴者水喝……开导民向善”<sup>[41]273-275</sup>的相关叙事,都具体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关于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的善恶认知与社交理念,传承着他们“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

### (二) 家族伦理的培育要旨

首先,祖嗣之间的制度伦理。彝族敬宗法祖的祖先观念浓烈,祖先谱系是他们在观念、精神和行为上增强家支认同和辨明身份位置的根基纽带,由它连接和组织的家支是其生存发展的依附支点、社会生活的保障机制及社会教育的实践机构。他们通过举行规模宏大、仪式繁杂的祭祖送灵仪式(如“尼木措毕”“耐姆”),履行后嗣之于祖宗的制度性义务,这种义务在彝族文学中有着明确规定。除《阿黑西尼摩》《土鲁黎咪数》中已举例证之外,例如《玛牧特依》也明确要求后嗣们要遵时守位地为祖宗除灵与祈祷。在他们的文化中,“三代超一次渡,三年一大祭,三月一小祭”<sup>[40]137</sup>是彝族后代子孙们向祖宗表达孝义和为其后代做出榜样的具体实践,表达和切实践行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孝悌精神和礼制传统。

其次, 亲子之间的代际伦理。亲子之间具有严密同一关系, 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责任与权益是相互的、规定的。父母应养育教化、平等对待每个子女, 并负责其终身大事。子女应尊敬孝顺、认真赡养父母, 并在其去世后送灵归祖。在习惯法中, 若有人违背代际伦理, 会被严惩。因此, 他们非常重视代际伦理的培育与传承。如《玛牧特依》指出“真正的父母, 要为儿孙立家业, 给儿娶媳妇。真正的子孙, 要为父母行好事”<sup>[40]105</sup>, “所有妇女们, 莫嫌弃娘家”“所有男儿们, 莫得罪家族”<sup>[40]133</sup>, 又如《土鲁黎咪数》要求父母“在子女份上, 不分轻重”<sup>[41]271</sup>。诸如此类, 都表达了他们亲子间的代际伦理。

再次, 亲族邻里之间的互惠伦理, 包括兄弟、姻亲及乡邻等的伦理关系。对于兄弟, 要秉承兄友弟恭、同心同德的理念。例如在《玛牧特依》中“兄弟要相互送行”<sup>[40]116</sup>的观点传递了兄友弟恭的情感。又如在《土鲁黎咪数》中有“弟不顶兄长, 兄问计于弟, 志不分兄弟, 兄财亦弟财, 互相不保留”<sup>[41]266</sup>的说法, 不仅要求兄友弟恭, 还要同心同德, 彼此一体。对于姻亲, 须提倡和睦相亲、互相帮助的思想。例如在《玛牧特依》中, 有“与亲家和睦, 指点好渡口”<sup>[40]131</sup>的观点、又如在《土鲁黎咪数》中, 有“与姻亲和谐, 为对方求富, 与之招富贵”<sup>[41]266</sup>的看法, 基本上传达的都是这种思想。对于乡邻, 要传承出入相友、互惠往来的精神。例如在《土鲁黎咪数》中就以正述的方式来明示邻里之间要团结友爱、扶贫济困。

### (三) 社会责任的形塑理念

首先, 自觉规范社会行为。彝族文学中规范的社会行为既要符合个人品性和家族伦理, 也要以遵守法制和认同国家为基本准则。例如《玛牧特依》中明确要求彝族子孙, “莫要去偷盗……偷家门赔和解饭, 偷家族赔黑牛”<sup>[40]42</sup>。其中, “莫要去偷盗”是劝慰规范自身社会行为, 不去侵害他人财产利益, “赔和解饭”与“黑牛”则是以“法律权威”来警戒彝族子孙如果发生社会越轨的行为, 将会被依“法”严惩。当然, 这里的“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而是法人类学理解和定义的“习惯法”。就偷盗而言, 他们会根据偷盗的地点、方式、对象及数量等因素, 约定形成了相对细致的集体规定。不仅如此, 彝族在古代时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 有自己的君长和君法, 例如在《土鲁黎咪数》中, 就有“民忠诚于君……臣民守王法”<sup>[41]267-269</sup>的描述, 由此将规范行为的制度视角提升到了国家和国家法的层面。这里的“君”和“法”既指代传统语境中彝族地方政权的君长及其法规, 也指王朝国家的皇帝及王法。如果将其表达的精神内核置于现代国家语境之中的话, 则相当于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如上所举, 皆为彝族人关于通过规范社会行为来形塑其社会成员之社会责任的理念表达。

其次, 乐于参与社会公益。彝族文学中存在大量鼓励人们参与公益事业的表述, 例如在《玛牧特依》和《土鲁黎咪数》中, 都从不同层面对彝族后世子孙们提出了相近的关于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要求, 即面对贫弱群体时, 不论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 皆应积极传承和主动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弱、扶贫济困的社会公益精神。总的来说, 后代子孙们积极和乐于参与社会公益, 既是形塑他们的个人品性以及培育家族伦理的基本要求, 也是评价其社会责任意识的关键标准。

最后, 公正参与公共事务。在彝族文学中, 非常注重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和参与态度, 积极倡导民主协商的决策方式和公正严明的参与态度。例如在《玛牧特依》中, 就曾指出无论是在举行祭祖大典之时, 还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 都要求“世上的人们, 商议要周密”<sup>[40]195</sup>, 如此才能有序地开展相关的活动。同时, 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还要秉承公正公平的公正精神和平等意识, 明确要求“所有的人们……莫偏袒一方”<sup>[40]255</sup>。又如在《土鲁黎咪数》中, 关于“兄问计于弟……讲公正守法”<sup>[41]266-274</sup>的要求也鲜明

地传达了他们关于民主协商、公正公平的决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sup>[42]</sup>，积极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sup>[43]</sup>。彝族文学通过朴实无华、朴素直接的语言，简单而鲜明地深描了关于他们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的道德文化与教育理念。发掘其中的道德文化与教育理念，有利于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家园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理念夯实根基。无论是关于微观层面的私德修养与家教家风，还是关于宏观维度的公德意识和大德精神，彝族文学中传递的传统道德文化和教育理念都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品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 四、作为共同体关联的彝族文学：多维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彝族文学不仅记叙和传递着族内认知，还包括许多族际认同的信息。它以彝族的主位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真实性以及合法性等特性。

##### （一）表述多民族本根论

多民族本根论<sup>[44]</sup>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在彝族文学中，多民族本根论多表述于洪水灾难后的兄妹成婚叙事中。与各兄弟民族相似，彝族也认为兄妹经“葫芦”“船”或“南瓜”等意象的保护而得以存活，成为各民族的再生始祖。不同史诗对同根共祖民族的看法存在数量和名称上的差别，如在《勒俄特依》中为“彝族、汉族与藏族”<sup>[40]84-85</sup>；又如在《梅葛》中为“汉族、傣族、彝家、傈僳、苗家、藏族、白族、回族”<sup>[35]39-58</sup>；再如在《查姆》中为38个，但只列出“彝族、哈尼族、汉族和傣族”<sup>[38]88-90</sup>；还如在《阿细人之歌》中则为“苗族、汉族和阿细人”<sup>[45]333-334</sup>。不同的本文中涉及的族类名称及其数量虽有差别，但并非他们认同的同根共同体排斥了未包含在内的其他民族。史诗产生发展于特定时空，囿于曾经有限的交往条件，他们将自身接触到的所有民族纳入了同根共同体。上述差别并未遮蔽和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事实和文化真实，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并无本质区别。

在彝族文学中，多民族本根论的记忆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具有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的客观表达和主动选择。历史地看，彝族属古氏羌族群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与众多民族存在血脉相连的同源事实，因历史性因素而多次分支与迁徙发展为当下的多个族群<sup>[46]</sup>。这种历史同一性存在于个体基因的文化事实得到了李济的生物学研究证明<sup>[47]295-306</sup>。现实地说，多民族本根论的形成与各民族长期的交错居住、接触互动有关。由于各民族地缘相近、族缘相亲、文化接触、社会交往增多，族类互变现象日益普遍，相互间的信赖、认同也会潜移默化地增强。在交融的过程中，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形塑了诸多共性。共性与个性并存的多民族本根论是经历了时空绵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代际拓展性的文化实践，它从彝族的内部眼界诠释了中华民族同源异流、源流交错、多元一体的历史本相与社会现实。

##### （二）传递中华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内涵的基本元素，作为中华文化的起源点而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储存着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理念与哲学思维，是决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传承的核心因子与基本纽带。它凝聚着认同中华文化之人的共同情感，是汇聚中华民族力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内力。中华文化基因的理念指向面广点繁<sup>[48]</sup>，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

宇宙观；天下一体、四海升平、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尊尊亲亲、仁者爱人、成己成人的价值观；人类一体、民族同根、互惠共生的民族观；兼收并蓄、互嵌共融、百花齐放的文化观；敬畏自然、绿色生态的发展观，都是中华文化基因的表现。

在彝族文学中，中华文化基因不仅遗传于其德育精神及多民族本根论，还储存于其宇宙观。他们的宇宙观传递了中华民族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文化基因。首先，各版史诗皆认为天地最初混沌一体，如在《阿黑西尼摩》中为“连体混沌”<sup>[37]28</sup>，又如在《查姆》中为“雾露混沌”<sup>[38]3</sup>，再如在《勒俄特依》中为“模糊混沌”<sup>[34]1</sup>，又如在《彝族古歌》中为“清浊二气”<sup>[49]8</sup>，而在《彝族史诗》中为“黑暗混沌”<sup>[50]2</sup>。不仅如此，在我国的许多古籍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学中，亦有类似表述<sup>[9]</sup>。这些表述看似是神话叙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阴阳和合的文化基因在多民族文学中遗传与共享的表现。混沌一体的共识与混沌意象的共存的共存，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各版创世史诗或神话中，皆有万物同源、一体相生的共同叙事。例如在《梅葛》中有“虎身化万物”的说法，又如在《查姆》中有“杪椌树生万物”的表述，再如在《勒俄特依》中有“雪生十二子”的叙述，还如在《阿黑西尼摩》中则有“西尼摩化生万物”的表达。虽然它们描述的主体形象有别，但是皆与“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一脉相承，在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文化基因的总表征。基于此，他们将许多自然物质拟化为与人类具有亲属关系和恩泽关系的生命共同体，对其加以崇拜和敬重，创造了敬畏自然、生命同源的生态智慧，丰富了中华民族绿色发展观的文化内涵，是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sup>[43]</sup>的文化资源。不仅如此，彝族文学还传递着其他中华文化基因，如射日神话中敬德保民的家国精神，葫芦神话中薪火相传的生殖崇拜等。对此，笔者另有文章论证<sup>[9]</sup>。

### （三）诠释中华民族关系

和谐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平稳运行和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通常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之上。和谐民族关系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布控与制度安排，还要有社会层面的机制扶持与利益引导，更与每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行为意愿休戚相关。民族意识与行为意愿是反映族内认同和族际交往的根本，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内力。树立各民族全面平等、紧密团结的观念，才能在外力的耦合作用下构建真正的和谐民族关系。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族际交往与认同情况，除了观察其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态度与行为之外，还要洞察其文化记忆中的民族意识。

作为共同体关联的交融记忆场，彝族文学不仅通过多民族本根论认同了自身与其他民族的同源关系，从根基上摆正了各民族的血统平等关系。同时，也论证了各民族之间属于休戚与共、彼此互助、遇事共商的亲密伙伴关系，而非具有高低差别的从属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认知才是他们之于族际认同的普遍民族意识表征。对此，可从相关叙事中管窥一二。例如在《玛牧特依》中，说道：“远路与近路，都是一条路。彝区与汉区，公鸡叫声同……莫看重绸缎，莫歧视麻布……莫轻视小的，莫看重大的。”<sup>[40]215-216</sup>这个说法以明述和暗喻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阐述了其叙事主体关于各民族无血统差异、高低分层、优劣之分的民族平等意识。又如在《天地祖先歌》中，描述了“啥米（汉人）、喽米（彝人）、卜绿（仡佬）、米阿（苗人）相聚来商量，商议来祭天”<sup>[36]</sup>的情景，鲜活地呈现了多民族积极参与共同文化活动时团结合作的景象。再如在《彝汉教典》中，说道：“彝族与汉族，同祖互不识。只有语不同，人却一个样，彝可变汉人，汉也能成彝。两者的关系，犹如船与楫……有船又有楫，众人用力划……亦

能平稳行”<sup>[51]228-229</sup>,更加生动地呈现了彝族人的族际认同意识和民族关系认知。它不仅从其内部视角认同了各民族同根的血统平等事实,还揭示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遍现象,证明了团结一致、互不分离、互助相长、携手共进的和谐民族关系之于社会和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性。

#### (四) 展示民族交融事实

在彝族文学中,记录了彝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真实,主要表现在文化互嵌、经济互补和生产互助三个方面。首先,在文化互嵌上,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为中华文化的缔造和中华文明的创造做出了积极贡献,将其与邻近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记录在文学叙事之中。例如在《勒俄特依》中,说道“彝汉相交杂,出门在一起,分散各走各……彝人说汉话,汉人留彝髻”<sup>[34]91-92</sup>,反映了他们承认自身与汉族在居住格局、语言文化和服饰装扮等文化习俗上存在交融复合和互嵌杂糅的关系。其次,在经济互补上,彝族在中国的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丰富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繁荣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例如在《俚泼古歌》中,说道“汉人会煮盐,摆衣去背盐,彝人去背煮盐的柴……上街去卖柴,上街去卖麻,上街去卖药材,买回盐巴来”<sup>[52]104</sup>,又如在彝文典籍《博潘特依》里面,有“物种的起源·茶的起源”这一部分明确说道“经千难万险,找来茶叶种……茶树在彝地,茶叶到汉区”<sup>[53]106-107</sup>,这些叙事都反映了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盐业、药材、纺织、新柴及茶叶等方面资源互补的商贸往来事迹,揭示了各民族间普遍存在且不可缺少的物品交换事实与经济贸易关系。最后,在生产互助上,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精神既传递在其深层意识,也实践于其生产行为。例如在《梅葛》中,详细记录了彝族与傈僳族、汉族等多个兄弟民族的杂居相处以及他们相互合作煮盐和养蚕纺织的生活故事<sup>[35]97-98</sup>,又如在《俚泼古歌》中,除了经济贸易之外,还记录了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团结协作打猎、平分共享猎物的故事<sup>[52]105</sup>,在仡佬族古歌《叙根由》中,彝族与仡佬族、汉族、苗族及布依族等兄弟民族合作擒獐、射羊的叙事<sup>[54]103-107</sup>恰好与此形成了鲜明印证。如上所举,皆为彝族文学中关于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生产活动中友好往来、团结互助之文化事实的重要例证。

## 五、结语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形式,彝族文学不仅是其文化主体之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及道德精神的记叙文本,还是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在当下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主基调引领下,它们与其他中华文化表征一样,都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推动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文化资源、解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符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重要基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支撑依据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 参考文献:

- [1] 刘宾.对界定“民族文学”范围问题之管见[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2):58-59.
- [2]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学、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4] 王宪昭.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
- [5] 刘慧梅,何竞.文化记忆与凝聚性结构的本土叙事建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2):41-45+52.
- [6] 李菲.民族文学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J].民族文学研究,2009(3):19-25.

- [7] 杨家勤.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认同的建构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6): 122-125.
- [8] 权晶. 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与认同[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9): 144-147.
- [9] 李宁阳. 历史根基记忆与中华文化基因——西南少数民族史诗与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155-168.
- [10] 肖智立. 民族文学中的共同情感塑造探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9): 90-94.
- [11] 董迎春, 覃才. 论少数民族诗歌的族性本体、文化书写及共同体价值[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55-164.
- [12] 舒乙. 民族文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4): 104-109.
- [13] 李晓峰.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J]. 民族文学研究, 2008(4): 5-11.
- [14] 叶舒宪. 中国文化的构成与“少数民族文学”: 人类学视角的后现代观照[J]. 民族文学研究, 2009(2): 55-64.
- [15] 黑格尔. 美学: 第三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6] 朝戈金.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J]. 百色学院学报, 2009, 22(2): 40-43.
- [17] 杨红. 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J]. 民族文学研究, 2018, 36(3): 13-20.
- [18] 纳张元. 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其族群建构[J]. 民族文学研究, 2013(2): 128-136.
- [19] 李世武.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与中华民族认同[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52-60.
- [20] 李世武. 神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为例[J]. 思想战线, 2021, 47(2): 30-41.
- [21] 罗世荣. 浅谈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支格阿龙[J]. 贵州民族研究, 1985(4): 92-96.
- [22] 王伟杰. 彝族史诗“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的箭垛效应研究[J]. 民俗研究, 2018(1): 119-125.
- [23] 陈永香. 彝族史诗《梅葛》所见的原始宗教信仰[J]. 宗教学研究, 2006(4): 140-145.
- [24] 李世武. 彝族创世史诗蕴含的宗教道德及其文化逻辑探析[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2): 163-167.
- [25] 李世武. 万物一体: 彝族史诗“梅葛”演述传统蕴含的生态智慧[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 12(5): 1-8.
- [26] 叶德跃. 试述彝族《查姆》中的阴阳五行观[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 35(10): 106-109.
- [27] 肖远平, 王伟杰. 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正能量文化精神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 35(5): 39-42.
- [28] 胡立耘, 李子贤. 原始性史诗存活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彝族史诗“梅葛”为视点[J]. 贵州民族研究, 2005(6): 122-127.
- [29] 陈永香. 彝族史诗《梅葛》的传承方式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10(1): 121-124.
- [30] 肖远平.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母题探析[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56-61.
- [31] 鲜益. 古典诗学与口头诗学的史诗主题叙述差异——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为例[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4): 24-28.
- [32] 陈永香. 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 以《梅葛》《查姆》为中心[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 [33] 胡立耘. 史诗的文本分析——以彝族史诗《梅葛》为视点[J]. 民族文学研究, 2005(2): 76-82.
- [34] 冯元蔚. 勒俄特依[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
- [35]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 梅葛[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
- [36] 王子尧, 张坦, 刘援朝, 等. 天地祖先歌[J]. 贵州民族研究, 1983(3): 208-221.
- [37] 施文科, 李亮文, 普学旺, 等. 阿黑西尼摩[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
- [38] 郭思九, 陶学良. 查姆[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6.
- [39] 罗艳秋, 郑进, 徐士奎, 等. 彝族医药历史源流探讨[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5, 36(5): 14-18.
- [40] 《彝族传世经典》编委会. 玛牧特依[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6.
- [41]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土鲁黎咪数[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5.
- [42] 习近平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EB/OL]. (2017-02-13)[2023-12-01].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213/c385476-29075643.html>.

- [4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0):4-27.
- [44] 李世武.多民族本根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2):1-11.
- [45]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 [46] 王文光,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47]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48] 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2003,(5):130-134+147.
- [49] 王继超,陈光明.彝族古歌:彝汉对照(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
- [50] 王富慧.彝族神话史诗选:彝汉对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 [51] 易谋远.彝族史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2] 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羌族、彝族[M].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
- [53]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辑[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
- [54] 罗懿群,吴启禄.叙根由:仡佬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

## Cohesive Structur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Y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LI Ningyang, MEI Jun

**Abstract:** Yi literature has significant ethnographic attribut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community function. First, it's a cohesive structure to construct the basi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serve as the carrier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knowledge map of Yi nationality. Second, it's a special text for inheritance of principal Yi culture and for dissemination of its moral spiri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ral education ranging from personal virtue to social ethics. Third, it's a memory converging locale for community connections, demonstrating in all respects Yi nationality's active and ingrained recogni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conscious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of minority groups, and expand and deepen our research into minority literature to provide stronger experiential and cultural support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minority literature; cohesive structure; ethnographic function;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